

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

申论官德

左宪民 杨 奎 等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申論官德

左宪民 杨 奎 等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申论官德 / 左宪民等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2. 4

(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200 - 09243 - 1

I. ①申… II. ①左… III. ①干部—道德修养—研究
—中国 IV. ①D630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8747 号

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

申论官德

SHENLUN GUANDE

左宪民 杨 奎 等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 100120

网址 : www . bph . com . 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 经 销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21 千字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09243 - 1

定价 5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 - 58572393

编写委员会

主任：王安顺

副主任：叶青纯 鲁 炜

执行副主任：傅 华 王海平 谭维克

委员：张才雄 丁 力 杜淑华 殷爱平

曲梅林 滕修展 岳 勇

编辑部：杜丽燕 赵雅丽 梁劲泰 匡淑红

左宪民 杨 奎 韩 华 尤国珍

领导干部要修身立德执政为民（代序）

从政重德，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，西周统治者提出“以德配天”、“明德慎刑”思想。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，形成了系统的儒家“德治”理论体系，其核心内容就是提倡“为政以德”、“为官以德”的德治学说。官德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道德，还是作为一种治政方略，无一不折射着古代贤哲杰出的治国感悟和政治智慧。

我们党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，始终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。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党员干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、一个纯粹的人、一个有道德的人、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、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，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，就愈要高度重视、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。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，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，还必须讲修养、讲道德、讲廉耻。

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并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、常思贪欲之害、常怀律己之心，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。这些重要思想，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，也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。

当前，在世情、国情、党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，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挑战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，应对“四个考验”、“四个风险”，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，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最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官德修养，兢兢业业，执政为民。历史和实践证明，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修养是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。

由市纪委、市委宣传部、市社科院联合组织专家编著出版的《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》，是一项利用古今执政智慧、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，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挖掘、整理历代“官德”思想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廉政教育相结合，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该丛书由《史说官德》、《大道官德》、

《为官史鉴》、《申论官德》四部组成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，对古今官德进行了深入研究，思想教育性强、可读性强，内容充实，可作为全市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教材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抽出时间来看一看这套丛书，对于大力弘扬和践行“北京精神”，升华思想境界，陶冶道德情操，培养浩然正气，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，一定会大有裨益。

刘谦

2012年3月16日



导

导 论

2010年5月，受中共北京市纪委和北京市委宣传部委托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相关研究所选拔专家学者，成立课题组，进行官德思想研究。接受课题之时，“官德”一词远没有今天这样高的关注度。时至今日，不得不让人感叹，此项课题的提出独具慧眼，且颇具前瞻性。

一、课题思路的确定

接到课题后，我们在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图书馆，以及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大馆，新浪爱问共享资料、中国知网、百度文库、超星图书馆等著名网站搜索有关官德研究的著作和论文。结果发现：有关官德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寥寥无几；而在寥寥的作品中，全面探讨中国传统官德思想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。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太多的参照系。这既是我们研究的难度所在，又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开拓空间。

当今，谈及官德，人们大多会从孔子开始，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”^①。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，人们多半会谈及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。学界认为，这是我国最早成文的行政法。

^① 《论语·为政第二》



其中的“为吏之道”提出吏有五善、五失。这五善、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，却是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。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。

从春秋到秦汉再到清代，为政清廉的教诲，散见于经史子集、刑典律令之中。从中找寻官德的教诲，如瀚海拾贝，阅读量之大是不难想象的。就文化表述方式而言，中国的儒释道法言简意赅，格言、语录是其最基本的表述方式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这种传统虽然有所变化，却没有根本的改变。杜甫诗句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尽管是比较极端的说法，却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在语言上刻意求工的传统。语言求工和思想表述寻求逻辑性不是一回事。

言简意赅是好事，一字一意。仅以《礼记·礼运》为例：
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^①

^① 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

这段文字共 107 字，勾勒出三代之英禹汤文武代的政治体制、家国天下、社会风尚。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被视为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，记载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希波战争史，洋洋洒洒 70 多万字，但涉及的时代和历史事件，却比《礼记·礼运》少得多。

孔夫子时代形成的文字传统一直保留下来。直到 1905 年，我国从日本引进西方式教育体制，中国逐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和与之相应的学科。教育的变革，是促成文化传统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。随着现代教育而渐次形成的系统化思维，几乎与中国现代化同步产生。在引进西方式教育体制百年后的今天，如果我们向读者介绍、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类见解，已经不可能依循传统方式，用格言语录来表述，只能采用今天的表述方式。具体到我们要进行的官德研究，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德，必须赋予它一个逻辑体系，在这个逻辑体系中阐释它的发展足迹。由于系统研究官德的作品相对较少，参照系甚少，故本项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是赋予官德研究一个逻辑体系。这个体系既指丛书的体系，亦指每部著作的体系。读者从本丛书看到的体系，是课题组成员的原创。

研究官德，无疑是以史为鉴，古为今用。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丰富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型官德。从五四运动、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、改革开放，90 多年的历程，新型官德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中逐渐孕育、产生、发展。研究这一历程，从



90多年的历史和文献中勾勒出新型官德的足迹，提炼出新型官德的基本内涵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新型官德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长成，因而传统官德与新型官德的内在关联和历史传承，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中国文化传统历史悠久、博大精深，足以令我们自豪。但同时也会导致另一个结果：对中国文化传统所做的任何一个专项研究，都有可能挂一漏万。官德研究也不例外。为了尽最大可能全面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德思想，我们决定，从不同的学科、不同的视角，运用不同的方法，进行多方位研究。经反复讨论，最终确定：（1）本项目名称为“中国古今官德研究”；（2）基本原则是：以史为鉴，立足当代；（3）总体思路是：对中国传统官德进行多角度研究；（4）成果形式是四本书，分别是：《史说官德》、《大道官德》、《为官史鉴》、《申论官德》，即史、论、例、今。

二、四本著作的功能定位

四本著作在“中国古今官德研究”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既单本独立，又是一个有机整体。

1. 《史说官德》

本著作是对官德进行“史”的研究。《史说官德》之“史”，有两个含义：首先，指编年史；其次，指文献史。“史”即是依编年史顺序展示历史文献中的官德思想。同样，史说之“说”，也有了与史相对应的含义，即“说”指“经史子集”中的官德论述。

由于受影视作品的影响，读者大凡看到“某说”，似乎



总觉得是编故事。戏说可能是浪漫故事，史说大概就是历史故事了。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，可以娱乐，却不是知识。为此，特提醒读者，本书之史说，乃从文献学的角度，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德思想发展的文献地图，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文献相对完整、全面，是一部文献资料翔实的“正说”。也可以说，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德思想的微型工具书。

在确定《史说官德》的编写思路时，课题组对受众有一个基本估计，即普通读者对中国古代官德有朦胧的印象，谈到官德都能说出一些名言警句。然而，除专业研究者以外，普通受众对官德真正知其然者不多，知其所以然者寥寥。本著作力求提供给读者一个官德思想发展的文献脉络，以便在他们拿到书的第一时间，获得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总体印象。如同为司机上路提供详尽的交通线路图，其中有各个节点的重要标志、有方便出行的各种提示一样。

《史说官德》对于撰写急就章的读者，可以用最短的时间，从中找到自己在这一主题上可以引用的名言佳句，并能找到较好的文献版本和白话文解读；对于力图恶补官德思想的读者，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；想要深入研究官德思想的读者，可以按图索骥，找到第一手文献资料。当然，“正说”并不妨碍作者用优雅轻快的文字，解读严肃拗口的典籍文献。相信读者在掩卷之后，能够感受到此书是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。不仅如此，《史说



官德》是“求全”之作，作者依托自己浑厚的文献学功底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官德思想文献史，并佐以历史背景的勾勒和对行文较为详尽、中肯的解读。专家给予的二字点评是：“厚重！”有感而发也！

2. 《大道官德》

本著作从中国哲学的角度，对官德进行“论”的研究。“大道”之“道”，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。“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，其实都来源于这个道。所以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‘道’字”^①。《说文解字·辵部》对道有如下解释：“所行道也。从辵从首。一达谓之道。”^② 辵指行走，首指头，辵与首组合在一起，意指“从头开始”。道的原始含义，首先是道路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”^③。“道阻且长”之道，即是指道路。“一达谓之道”主要含义是行，“行”的衍生意义即“做”。

作为中国古典思想的核心概念，“道”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。学界习惯上按照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界定“道”的基本内涵：天道与人道。《易经·系辞传上》曰：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黄庆萱先生认为：“形而上，指在天地形象上存在的抽象原理；道，是乾坤之合德，犹阴阳两仪之于太极。所以‘形而上者谓之道’与‘一阴一阳

① 南怀瑾《道与中国文化》，《中国商人》，2008年第6期。

② 柴建虹、李肇祥主编《说文解字》，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4页。辵，读chuò，乍行乍止也。

③ 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。



之谓道’含义实同。形而下，是天地变化向下落实到现象界；器，是阴阳交感所生的具体事物。”^① 南怀瑾先生提出另一种解释：“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做‘道’，在儒家思想叫做‘天’……‘形而下’是指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。”道与器的关系是道先器后，对于这一点，所有的研究者均无异议。所谓“天由道而生，地由道而成，物由道而形，人由道而行”^②。天、地、人、物，由道而生。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^③。儒家论道，多注重“人道”、人伦之道；老子之道，多注重“天道”、自然之道。

人道，首先指道义、正义。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^④之“道”即指正义、道义。其次，指学理或宗教教义。“悦周公、仲尼之道”^⑤。最后，指方式、方法、技能。“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”^⑥。这一含义在今天也为人们广泛使用，如生财之道、养生之道等。

《大道官德》之“道”，从天道与人道的层面来探讨官德。因而这里所说的“道”，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、文化理想、政治理想、道德理想等，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

① 黄庆董：《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析议》，参见《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·易学卷》[c]，2005，此论文来自百度百科 <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73f2ffd850e2524de5187eeb.html>

② (清)刘斯组辑，包耀参校《皇极经世緒言》。转引自黄庆董：《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析议》。

③ 《周易·说卦》。

④ 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
⑤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

⑥ 贾谊《过秦论》。



会文化、政治、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。在古代中国，思想学说和宗教教义主要指儒释道法。大道应指最高道德理想。《圣经》用“WORD”一词代表上帝说的话，中译本通常把 Word 译作“道”，即圣言。在哲学上，Word 至少有 logos^① 的意思。

依据上述对道的理解，“大道官德”指为官者最高的道德理想。道德属实践理性，为官之道德需要在日常执政中践行。这便决定了《大道官德》一书必须在特定的政治制度、司法体系以及社会结构中探讨儒释道法的官德思想。原因有二：

第一，儒释道法的官德思想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系统理论，而是语录式的说教，它之所以成为有体系的东西，是由于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结合在一起。体系是由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赋予的。儒释道法对中国历史、政治制度、思想文化的影响是不均衡的。儒家修身、佛家修心、道家养性、法家尚法，这既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处世哲学和政治主张，也成为统治者重要的思想基础。不论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，还是对当今中国人的性格习俗，都有深远持久的影响。可以说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基本上是儒释道法的合力所成，是在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宗法体系中运作的。

① logos：希腊哲学、神学用语，指蕴藏在宇宙中，支配宇宙，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的神圣又理。详细说法可参阅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1986 年中译本，第 5 卷，第 517 页。



第二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多由士大夫阶层提出。士，文人也。“春秋之末，至于战国，诸侯卿相皆争养士。”^① 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文人多浪迹于各诸侯国，向君主、三公九卿、达官贵人、名门望族兜售自己的知识和才能。倘若文人们的知识才能受到权贵们的赏识，便被留在府邸，供给衣食。当权贵们遇到重大问题或处在关键时刻，便会请文人们为自己出谋划策。这一风气被称做“养士”。“养士”，也称养“食客”、养“门客”。被养之士的知识，基本上是可用的计谋，士的作用即是献计献策。计与策为所献知识，而被献者无疑是君主、三公九卿、达官贵人、名门望族。“养士”的习俗表明，文人是依附性群体。双方的关系是著名的“皮毛”关系，所谓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毛之可附，在于有用。由此造就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：为急用而生，事实逻辑长于理论逻辑。事实逻辑的支撑者通常是政治制度、司法制度、国家政治、文化、习俗以及当下遇到的问题。因此，依托事实逻辑展开的《大道官德》，是将官德置于历史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结构坐标中，行文必然具有当下文字鲜活的特点。探讨问题的方式和角度，也与这一坐标密切相关。作者以良好的学养款款道来，将中国儒释道法官德思想的深邃内涵，系统全面地挖掘出来，掩卷后有绕梁三日之感，难怪乎专家给予的二字点评为：“深刻！”此言不谬也。

^① 苏轼：《论养士》。



3. 《为官史鉴》

本书由经典案例组成，也是一本微型工具书。如果说《史说官德》的特点是“全”，那么《为官史鉴》的特点则是“精”。

中国历史年代久远，为官者不胜枚举。对于官员，人们通常喜欢用“好官”、“坏官”、“清官”、“贪官”、“庸官”、“昏官”描述之。民间常常把好官称做“清官”。在经史子集中，好官也被称做“循吏”、“良吏”、“廉吏”等。“循吏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史记》中，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直至《清史稿》，“二十五史”中，19史有《循吏列传》，共涉及循吏240人左右^①。所谓循吏就是“奉法循理之吏”^②，坏官通常指贪官。贪官者，贪赃枉法之徒，贪墨败度者也。所谓“狡吏不畏刑，贪官不避赃”^③。

《为官史鉴》将贪官分为三类：贪渎、权奸、酷吏。贪官的特点是物欲横流、鱼肉百姓、凶残暴虐；表现形式为贪、腐、恶。“二十四史”中，10史有《酷吏列传》，涉及酷吏110名左右^④。好官、坏官，衡量标准不过良心二字。凭着良心为官，好官也；昧着良心为官，坏官也。清人叶镇撰有《作吏要言》云：“为官，须求消受得过。”“‘消受

① 程遂营：《“二十四史”〈循吏〉、〈酷吏〉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》，《北方论丛》，2001年第1期。

② 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③ 皮日休：《橡媪叹》。

④ 程遂营：《“二十四史”〈循吏〉、〈酷吏〉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》，《北方论丛》，2001年第1期